

<梁英明印尼生活回忆> 之五

雅加达华校学生联合会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逐渐失去民心,全国人民都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这一变化对印度尼西亚华侨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的影响是迅速而深刻的。在巴中和其他华校中学,学生自治会的活动呈现日益政治化的倾向,各班级出版的壁报和油印小报上充满了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字。我被推选为巴中学生壁报的编辑。

为了协调各校学生的行动,以便相互支援,1949年成立了雅加达华校学生联合会(简称椰华学联,因当时华侨习惯称雅加达为椰嘉达,简称椰城)。雅加达学联采取团体会员制,巴中、华中、八华、新华等华校都是团体会员。学联主席由各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轮流担任。经过协商后,第一届主席是巴中学生自治会主席张瑞元,第二届主席是华中学生自治会主席屈胜源。学联日常工作由秘书长负责,我在1950年6月毕业前一直担任学联秘书长。当时,我们三个人都是高三学生,功课繁重,但是都积极热情投入这项工作。我们经常在下午课后,在班芝兰街的中华中学旧校舍内开会,每次都要开到傍晚才结束。然后,我们在班艺兰的小摊上分别吃一盘炒饭或炒面作为晚餐。

雅加达学联的主要工作包括:

一,了解各华校学生自治会的活动情况,交流各校工作经验,支持其他地区华校学生开展爱国进步活动,以及支持华校师生反对个别右派教师和董事会成员的斗争,等等。据我的记忆,张瑞元、屈胜源和我曾代表雅加达学联到直葛(Tegal)中华学校支持学生反对个别右派教师的行动并最终获得了胜利。此外,雅加达学联还曾派人或写信支持万隆、茂物、井里

汶等地华校学生的斗争。

二,为便于各校学生自治会交流经验,雅加达华校学联自成立之初开始出版《学联月报》。该报每期出版对开纸四版,铅字印刷。内容主要是由各校学生记者和通讯员撰写的活动报道,以及编辑部撰写的评论和时事分析,也发表一些同学的散文、诗歌等习作。编辑、记者等工作人员都没有任何报酬。《学联月报》每期大约印500份,分送各校学生自治会。所需费用得到雅加达爱国华商的资助。我在1950年6月毕业前一直担任《学联月报》的主编。

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学联会推动各校成立了歌咏队、舞蹈队、话剧社等,在学生中推广爱国歌曲和国内解放区流行的民间舞蹈。歌曲有《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旗正飘飘》等,舞蹈有《秧歌舞》《红绸舞》《采茶扑蝶》等。这些歌舞资料主要是通过香港的爱国团体和学校师生学会提供的。1950年暑假期间,雅加达学联组织了100多人的大型艺术团,到万隆、三宝垄、泗水等大城市巡回演出,受到各地华校学生的普遍欢迎。艺术团成员还义务向各地同学传授这些歌舞。他们学会表演的这些节目,成为后来各地华侨庆祝中国国庆节活动的重要内容。参加艺术团演出活动的同学都自己承担所有费用。

雅加达华校学联的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各华校师生的爱国热情,印度尼西亚各地也纷纷成立了华校学联会。为了进一步联络各地爱国华校,团结广大师生,于1950年又成立了爪哇华校学联会,简称爪华学联。

可能由于爪哇华校学联会的发展过快,成员众多,实际活动仍局限在雅加达地区,其他地区的工作难以推进。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相继实施限制华侨爱国活动的条例后,爪哇华校学联会实际上已难以发挥

作用。1950年6月我高中毕业后,也离开了雅加达学联会的工作。

华侨青年学习社

中国国内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变化,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到1949年,形势已经变得明朗,我们的祖国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面对这个崭新的时代,同学们的心情从兴奋、期待到热烈向往。

1949年初,巴中一部分同学成立了一个时事理论学习小组,每个周末下午在一起讨论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著作。初期成员是高中部卓宝琴、陈炳辉等同学,后来我也成为学习小组的成员,还有一些初三学生也陆续加入。这个学习小组不公开发展成员,只个别吸收被认为积极可靠的同学加入。尽管如此,它还是很快壮大,称为华侨青年学习社,简称学习社。同时,在华中等华校也成立了一些类似的组织。

不久,中国华北地区解放。1949年7月,巴中、华中等校的部分高中毕业生回国升学。尽管当时华南地区尚未解放,这些同学仍毅然乘船冒险穿越台湾海峡,从天津上岸到达北京。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在印尼的广大同学,此后每年暑假回国升学的毕业生不断增多。在雅加达丹戎不碌(Tanjung Priok)码头上,欢送这些毕业生乘船回国的人群中,不但有他们的父母和家人,更多的是来欢送同学回国的学弟学妹们。大家在码头上依依不舍地握别时共同喊出的心声就是“祖国见!”“北京见!”,形成了激动人心、盛况空前的青年学生回国热潮。有些同学由于父母反对他们回国,甚至偷偷办理了离境手续,买好船票和准备行装,然后在开船当天混入送行的人群中上了船。当轮船到达新加坡停留过夜时,才上岸到邮局将写好的告别信寄回印尼家中。

在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巴中的教学水平和师生的爱国进步思想越来越为各地青年学子所向往,使巴中每年招收的学生不断增多,一些原在其他学校就读的学生也纷纷转入巴中。巴中在校学生人数从1000多人增加到2000多人。到1955年我回国时,巴中在校学生已达3000多人。

学校规模的扩大就意味着需要更多教师。然而,自1949年后,已经不可能从中国内地招聘到教师。我在1950年高中毕业前,本来已决定和同学们一起回国上大学。但是,由于“革命工作需要”,让我和同班的黄天美同学留校当青年教师。此后,巴中、华中等爱国华校每年都要劝说一些毕业生留校或到其他地区的华校任教,因而推迟回国升学,这种做法似乎成了一个惯例。后来,在留下的同学当中,有些人甚至一直任教到1966年所有华校遭到当局关闭时为止。他们对华文教育事业的付出和贡献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当然,也有一部分同学在其他行业工作,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时,中国国内所有学校的招生考试都包括政治科目,而海外华校又不可能设立政治教育课程。1950年后,为适应毕业生回国升学的需要,华侨青年学习社开始举办学习大班,上课时间为每周日上午,由我担任主讲教师。讲课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以及中国革命形势分析等。尽管我们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上课内容也不是学校规定的必修科目,但是经常听讲的同学达100多人。

华社的分化与争斗

1945年8月,中国历经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后,获得了最后胜利。作为战胜国,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并成为联合国的常

任理事国之一。这个历史性的变化使海外华侨倍感欢欣鼓舞。当时,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几乎一致团结在中华民国的旗帜下。但是接踵而来的内战又使广大华侨感到困惑和沮丧。对祖国这场内战的立场和态度,很快使印尼的华侨社会出现了政治立场的分化。

到1949年,许多人开始认识到蒋介石政权的专制独裁和贪污腐败本质,而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这一思想转变在青年学生中表现得最为迅速和明显。同学们对那些继续拥护支持旧政权的教师、董事和社团领导人日益感到不满。各华校都相继发生学生反对右派教师和董事的行动。

同时,在当时的华文报刊上,每天都可以看到两派激烈辩论的文章。到1950年,在雅加达几乎所有华侨社团领导机构的选举中,都出现了左右两派成员激烈争斗的场面。他们从相互谩骂发展到肢体冲突。在选举结束后,失利一方由于不愿接受选举结果,甚至动手从对方手中抢夺社团的公章。在争抢公章的打斗中,自然是以华校学生及华侨青年为主力。

华侨政治立场的分化和两派争斗现象当然不限于雅加达,而是遍及印度尼西亚几乎所有城市的华社。在梭罗,我父亲和他领导的广肇会馆原来是倾向于右派阵营的,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的思想有了转变,也开始在《生活报》上发表自己的诗作。1950年印度尼西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他带头升起了五星红旗,因此被当地一些国民党人指责为被“赤化”分子。

1951年后,华侨社会两派的阵营逐渐分明。不同立场和观点的教师、董事逐渐分别集中到不同的学校和社团中。两派争夺学校和社团领导权的公开争斗才逐渐平息,“抢公章事件”也没有再发生。当然,